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

——英美模式 vs. 日德模式

[英] 罗纳德·多尔 著
李 岩 李晓桦 译
郑秉文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英美模式 vs. 日德模式 / [英] 罗纳德·多尔著; 李岩, 李晓桦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8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7-80149-688-4

I. 股… II. ①罗… ②李… ③李… III. 资本主义经济—经济模式—对比研究 IV. 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9996 号

·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

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

——英美模式 vs. 日德模式



著 者: [英] 罗纳德·多尔

译 者: 李 岩 李晓桦

审 校: 郑秉文

责任编辑: 许春山 周 炜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0

字 数: 224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688-4/F·213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Ronald Dore

STOCK MARKET CAPITALISM: WELFARE CAPITALISM

Japan and Germany Versus the Anglo—Sax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 版本译出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出版者的话

资本主义自 15 世纪初萌发以来，迄今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学界一般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萌生、生育并最终取代封建主义的阶段，为期约 300 年，即从 15 世纪初到 18 世纪中叶的英国产业革命。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为期约 150 年，即从 18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在这个阶段中，随着资本的扩张和产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即是以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给后人留下了经典性的理论分析、批判和阐释。第三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期约 50 年，即从世纪之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传统上认为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界定富有权威性，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第四个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国家垄断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此外，有人还认为从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垄断后的阶段，但此说在学界见智见仁，争议颇多，有待事态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理论上的深化。

不言而喻，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对象，人们最为关注的当是

同世人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的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质的飞跃、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为世人所瞩目。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出现了某些母可否认的新现象和新变革。早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就以“资本主义改变了吗？”为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就国际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界说而言，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概括起来大体上可分为四大派。

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推动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新的质的飞跃。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十分错综复杂。

另一种观点则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其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几种新的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①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改变；②体现阶级调和的某种准政治的雇佣结构；③政治体制的合法化的日益强化的需要。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合理性的危机代替了经济危机”。官僚化的过程正深入国家和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传统的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各种管理方法、专业化和科学技术。

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企业正在迅速发展成一种以美国传统为基础的新式制度，它将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并最终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从而形成“新资本主义”。而“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与自由企业制度的结合。

第四种观点主要是被称为“未来学家”的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发明导致“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但今天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自由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面临崩溃，其基本原则正在消失。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因素——财产、某些形式的自由、家庭、代议制民主和自由契约制度正趋于解体。一个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或“第三次浪潮”、“科学社会”已经来临。

不言而喻，上述观点的划分是十分粗略的，每一派观点中由于视角和重点不同，存在着很多差别。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在战后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但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这样的变化，是否存在从量到质的飞跃，则由于立场、方法、视角，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分歧和差异，这是毫不足怪的。应该说，现代资本主义作为我们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对它的研究完全是开放的。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被看做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制度，是“恶”的代名词，其一切都应该否定。所以，谈不上对它作认真的研究，往往只是从经典著作中引章摘句，削足适履，把极大变化了的现实硬塞进现成的框框里。这种简单化的教条主义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实则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归根结蒂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也是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同时，在当代世界中，必须看到社会主

义国家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质的差异,但今日所有的国家都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需要每个参加者都要像资本家那样对待这个市场中的其他参加者,参与合作和竞争。这样的客观需要也要求我们认真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以期收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效。

有位意大利的左派学者在总结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并不了解它。这一方面说明了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教条主义危害之烈,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发展和运动过程,有其固有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兼听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加以分析、探讨和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和科学分析。发扬真正的学术民主,倡导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争鸣,乃是保障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本着上述精神,为了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这方面的有关著作,无论中外,只要论证有据,资料确凿,言之成理,即使是一家之说,均在本丛书收入之列,以期为我国的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比较完整的参照,来深入了解和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面貌及其未来走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译者的话 股票·福利·经济制度

——昂格鲁－撒克逊模式与莱茵模式的比较

今年 77 岁高龄的罗纳德·P. 多尔 (Ronald Philip Dore) 教授是经济制度比较研究领域一位勤奋和多产的著名经济学家。从 1959 年出版第一部专著《日本的土地改革》开始，到去年出版的摆在各位读者案头的这本书，几十年来，他的学术耕耘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欧洲模式（或称莱茵模式）与东亚尤其是日本模式的比较上，至今他出版了 18 本专著，发表了近百篇论文。在众多的著述中，他关注的主要是欧洲和日本在教育、农业、城市化和企业制度等部门和领域的比较研究方面。多尔教授 1947 年从伦敦大学 (University of London) 毕业之后，始终没有离开过大学，曾在英国的伦敦大学、Sussex 大学、加拿大的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等多所大学任教；曾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学术院和美国、日本等多所其他学术机构授予的近十种荣誉称号；现任英国 LSE “经济运作研究中心 (the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高级研究员，英国三种学术刊物的编委。

在今年 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有幸与他相识，他此次来华讲演的内容就是“股票资本主义”这本书，当时我对书中的内容很感兴趣，并即席提了几

个问题,萌发了将其译成中文的念头。由于我正在做合作主义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问题,而多尔教授在这方面早已成名,著述颇丰,资料也多,便经常向他索取一些资料 and 通过电子邮件请教一些问题,就这样我们很快比较熟悉了。

奉献给大家的这部中文版著作,是两位译者花了半年多时间辛勤劳动的结果,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贺。我作为审校者(由于时间关系我只通读了中文稿,校正了一些术语和人名,而没有对照英文原稿做通篇审读,从这个意义上讲,“审校者”这个头衔有点儿使我感到惭愧)有幸成为其第一位读者,感到非常高兴。正如本书作者多尔教授自己所言,这本书非常“晦涩,直硬^①”,读起来比较吃力。为了写这篇介绍,我至少认真地读了两、三遍,还通过电子邮件向多尔教授请教了几处似懂非懂的地方。这是一部政论性的经济制度比较研究的学术专著,资料翔实,很口语化,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文化、历史、公司治理、银行金融等等,很有参考价值,我向读者热烈推荐这本书。为了使中国读者能够准确容易地理解这本书内容,本书作者多尔教授不但为本书专门写了中文版序言,而且还主动将其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赠予我们作为附录附后,这里向他一并表示感谢。

日本经济进入90年代以来长期处于萧条状态,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和研究。中外学者撰写的著述中越来越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想法:曾被认为是“经济奇迹”的日本经济之所以长期走不出谷底,其根本原因是这个曾经为日本带来经济繁荣的经济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病。对此,日本的官方和学界经过长期和艰苦的探索也给予了证实。日本经济企划厅1996年“经济白皮书”指出,“或许是由于规定以往日本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在目前时代已

① 引自本书第十一章。本文的数据均引自本书,下面除引文以外不再逐一注明出处,请读者原谅。

步入疲劳状态。”由此看来，被称之为制度弊端的“制度疲劳”就是日本经济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它已成为比较经济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题目^①。

那么，日本的“制度疲劳”主要表现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弊病？如何医治这些弊病？它与欧美的经济制度有何区别？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作为日本问题专家的英国学者，多尔教授以一个欧洲人的视角，在这部制度比较的专著中将“股票市场”作为分析工具和研究起点，独辟蹊径，在据此将经济制度分为“昂格鲁－撒克逊”和“莱茵”两种模式的基础上，运用大量资料比较研究了两种制度模式的异同特征，对欧洲经济制度做了入木三分的比较分析，对德国模式中存在的弊端进行了鞭挞，并且，对日本经济的“制度疲劳”即制度弊端产生的文化、社会、政策和企业方面的背景和根源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书中也偶尔对中国的股票市场和经济制度问题发表了一些评论。

简而言之，这本书是紧紧围绕如下这些命题和问题展开讨论的。

一、“生产至上”与经济模式

多尔教授基本上赞同阿尔贝尔（Albert）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②中将现代资本主义分为两种模式的观点，即当代资本主义可以分为以英美为代表的昂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

① 1996年日本经济企划厅“经济白皮书”的这段话转引自余英时：《制度的“疲劳”与日本经济的再生》，载于《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1期，第68页。该文对日本经济制度的弊病做了详实的分析。

② 很巧合，在本书之前，阿尔贝尔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这本书已被社科文献出版社列入“资本主义研究丛书”之中并已于1999年10月出版。

式,后者包括日本、德国、荷兰等等。但是与阿尔贝尔不同的是,多尔认为资本主义的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更多的是呈现出的多样性,甚至,同属莱茵模式的日本与德国之间就有许多不同之处。日本模式曾被人们推崇为“日本奇迹”,许多国家欲为之效法,但今天看来,它是赶超型的经济模式,在强大竞争的新时代里却失去了功效,成了“改革的对象”^①。与日本相比,德国则具有被英美模式同化的更大的可能性;就价值观、伦理标准和民族精神等来讲,日本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要远远大于美德之间。所以,日本和德国之间在经济体制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上述观念上的差异性强化了经济制度的差异性。那么,日本与德国之间、英美与日德之间的差异究竟表现在哪里呢?这就是本书的写作主旨。

本书英文原著的书名为《股票资本主义与福利资本主义——日德模式与英美模式》(*Stock Market Capitalism: Welfare Capitalism——Japan and Germany Versus the Anglo-Saxons*)。我们可以发现,在书名原文中有“福利(Welfare)”二字。在多尔教授看来,日德模式与英美模式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对股票价值的理解上及其观念的差异上。那么,股票与资本主义福利、股票与资本主义模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在英美模式中,公司的股东利益至高无上,股东利益无疑优越于雇员利益。对股东来说,公司被认为主要是甚至专门是通过投资为其谋取利润和使其资本增殖的工具;对公司雇员来说,公司企业不是为其谋取利益的福利机构;对整个国家来说,股票市场是最终衡量公司业绩与成败的核心指标,股票指数是衡量国民福利的主要标准,股票市场价值的最大化就意味着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没有任何其他更好的多元化的公益标准可以作为衡量社

^① 见附录《股票资本主义及其普及》。

会福利和社会发展的指标；就是说，在英美派眼中，公司资产和股东价值在公司中是占主导地位的，财产权优先于任何其他权利，财产的地位优先于任何其他利益的地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从“股票”的作用这个独特的角度来分析，可以将企业分为两种模式，进而可以把经济制度分为上述两种模式，而英美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金融化”或“市场化”即“股票化^①”。

多尔教授认为，日本是将儒家思想运用到经济领域的典范。而日本模式的重大特征正好与英美模式相反，它是即非“金融化”又非“股票化”的典范。日本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遗产是“生产至上”，即“造物文化”远远优越于“挣钱文化”；“生产”比“挣钱”更具有价值，更为优越。在这些方面，德国与日本比较相似，即在日德模式中，“金融化”的初始状态和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都体现出了一种高度的“制度化”趋势，它对不确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效率具有排斥性。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远远不如英国和美国经济那样以证券市场即以股票价值为中心，对此，书中给出了大量的数据予以支持。例如，绝大多数德国和日本的大众报纸只有很小的版面留做“家庭金融服务”栏目，债券在日本和德国的家庭投资中只占有很小的一部分，1996年大约是6%，而美国则高达20%；经济景气时美国家庭将其145%的收入投入股票市场，而德国不足20%，日本仅略高一点。

在储蓄方面，日本民族具有勤俭持家的传统；日本的储蓄始终留在国内，为日本资本市场提供了廉价的资金来源，使日本公司比国外竞争对手更具有资金成本的优势；这个传统是导致日本公司交叉持股的重要原因之一。资本市场要求具有透明度，进入

① “股票化”这个概念是笔者对多尔教授“金融化”这个概念的直白表述。在多尔那里，“金融化”的意思是指一国经济以股票市场为中心。

这个市场就要有获利的预期，而交叉持股的现象则严重破坏了日本资本市场的这两个原则。交叉持股的后果是“你不要抓破我的脸，我就不会抓破你的脸”^①，多数日本企业家坚持这个主导原则的目的在于防止企业被收购，于是整个经济制度运行的目的最终就演变成了是防止破产和被兼并收购；其结果将导致在保护投资者公共利益上起了相反的作用，潜在的投资者被吓跑，市场交易贫乏，整个经济由于资本市场缺乏效率而遭受损失。二战后初期，大型财团被没收、分散和资金被自由化，由此引起了提防被强大的美国公司大批吞并的极大恐慌，从此，日本公司便逐渐形成了交叉持股的理念惯性，使得多数大公司都有其“稳定股东”，以构筑免于被吞并的安全保障。通常，日本公司 60% 或 70% 的股份都控制在向其提供贷款的银行、提供保险的保险公司、或进行大量贸易来往的其他工商企业手中，而且，和这些工商企业绑在了一起，也就意味着与支撑他们的银行绑在了一起，股权控制的结构和方向大多是相互交叉的，例如，日立公司拥有几百万尼桑的股票，反之亦然。这种稳定控股的关键，在于股东对与股份公司的其他生意往来，比对从控股行为所得到的利润更感兴趣。股权只是多方位生意关系中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不被视为可以全面利用的财产权利。日立与尼桑虽互相控制股权，但双方都没有强行要求高于惯例的分红意愿，因为如果有一方这样做，另一方的回答便是“你也一样”。对于日本公司交叉持股的现象，有人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他们认为，交叉持股可以促进公司之间的合作与合资；它减低不对称信息的交易成本，鼓励长期稳定的合同关系；它可以降低股本收益率的重要性，使其不作为惟一的管理目标；更重要的是，它将经理们的精力转向公司长期发展计划，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着眼于信息收集，以改进商业决策。最重

^① 引自本书第四章。

要的，交叉持股是防御吞并的重要堡垒。交叉持股是日本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丰田是樱花银行的第五大股东，持有2.6%的股份，而丰田自己的5%股份为樱花银行持有。近年来交叉持股现象有所减少，例如，1987～1992年之间，交叉持股占全部股份的21%，到1999年下降到16%。

交叉持股现象的盛行，固然与日本德国两个国家对股票作用和股票价值的理念认同有很大关系，但同时就日本来说，它与日本企业的终生雇佣制、客户关系中的关联交易、非竞争性的合作、政府的经济干预作用等等也有直接的关系，这4个特征被多尔教授概括为日本是“一个长期承诺的社会”。下面，我们将逐一一对这几个方面的经济特征予以分析。

二、雇员至上与终身雇佣

英美模式中公司的员工始终保留自己的选择权利，能够随时自由更换工作和随时变换其效忠的对象，投资者可以及时转移投资；资本是通过其代理人雇佣劳动。英美模式对企业管理的基本出发点有两个标准：一是企业效率以它对投资者的回报为衡量依据；一是经理听命于资本所有者。所以，美国的委托代理理论比较发达。与英美模式和德国模式相比较，日本的企业结构有如下三个特征：

——日本人更喜欢放弃选择而做出长期的承诺。这可以被看做是雇员至上的一个重要表现。由此，日本企业体制建立在不同的双重理念之上：企业的效率标准不仅仅看它给予资本所有者的回报，更重要的还须看它给予消费者、地方和国家的回报，甚至还要看他対雇员给予的回报，包括中层经理和工人，从而形成了类似团队的实体，而远非是完全按照合同雇佣劳动、听命于经理的临时集合体。促使经理层发挥功效的外部控制更多地来自于生

产市场者的反馈，而不是金融市场。也就是说，真正控制日本企业的力量不是资本的所有者本身，而是同时来自于企业组织内部的经理员工和企业外部的诸多相关利益者，这些因素几乎和效率同等重要。

——日本企业管理方式是所谓的垂直领导形式，即“毛细血管”式的内部控制体制。终身雇佣体制使年轻的初级管理人员必须听命于他的上级的指示，因为他必须要默默无闻地等待着提拔。而在英美公司里，高级管理层的任免，无论是由外部市场决定，还是公司内部提拔，在总裁发布任命之前，通常候选人和董事会之间要进行关于酬金的谈判：多少年薪、多少股权、多少退休金、多少业绩奖金以及如何计算、合同期满前被解职应如何处理，等等。惊人的高额酬劳往往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它反映了董事会对候选人特殊能力的预期，这种能力预期则将为股东带来较好的收益预期。

在日本，不存在“本国”的外部市场提供高级管理人才的现象。猎头公司几乎所有的生意都是把人才从外国公司挖到本国公司，或是从一家外国公司挖到另一家外国公司。除非公司已危机四伏，否则，日本公司的总裁几乎百分之百是公司内部产生、内部任命的。

——英美模式与日本模式的企业工会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区别。在日本，工会通常会一边依靠公司的投资计划，一边指出雇员正处于家庭生活中开销吃紧的阶段。而英国主管在成功地将工会提出的增加5%的工资降到3%之后，会有权认为此举使主管层的工资调幅有了更大余地，而且他成功的谈判技巧应该使他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英美公司的主管们全心为公司所有者效力，而资本所有者希望能以最低的价钱买到公司所需的最高质量的劳动力。正如资本所有者希望经理能拿到原材料的最低价格一样，他们对具有良好谈判技巧的经理在给公司节省了大量劳工成本之

后会自然给以奖励。而在日本模式中，当主管经理成功地将工会的要求从 5% 降到 3% 之后，虽然这对他的业绩会有所帮助，使他有更多的升迁机会，但是他的基本工资却只会因此增长 3% 而不是 5%。相比之下，在日本公司，没有人太多地考虑到公司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公司不被看做是任何人的而仅仅是“组织”的财产，与公共的官僚机构没有什么区别：人们加入公司，谋取得一份工作，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仅此而已。主管层的年薪比例，正如上面所述的总裁年薪和中级管理人员年薪一样，取决于工会谈判的结果。

由此可见，日本企业中传统理念统治着雇佣劳动，这个理念认为整个工人队伍就是一个社团，社团精神具有强烈的“团队精神”，而企业的高级管理阶层就是这个团队的“家长”；公司更像一个团体而不是契约组成的网络或契约的结果，董事会更像是企业团体的长者而不是股东的代理。在企业结构与雇佣制方面，德国与日本相比略有差异。

在德国，维系所有者、管理者和工人关系的法律制度中没有日本那样多的传统理念，法律被认为是承认阶级存在和阶级对抗的起点和产物。公司的“共同决策”和工资等待遇方面的集体谈判这个双重制度使得工人和股东的权利得以平衡，从而可以约束企业管理者既要为股东的“福利”负责，也要为工人的福利负责。

德国企业“共同决策”的机制是德国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德国法律规定，在超过 500 人的企业要建立工人联合会，共同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在雇员少于 2000 人多于 500 人的公司里，工人代表拥有董事会 1/3 的席位；一般情况下，工人可以派代表参加企业的监事会。

与“共同决策”制度的法律地位相同，德国解决劳资关系的另一个支柱是集体谈判制度，它同样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集体

协商享有自由地不受地区干预设定工资水平的权力，受到宪法的保护，而且这样签订的合同在法律的保护下使企业和社会更具有内部稳定性。任何地方的劳动部长可以将任何工资和工作环境设定的合同条款应用于相关产业中，并使之法律化，即便它不是这个雇主联合会的成员。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德国，阶级仍然很重要，而在日本，企业更重要^①”；德国的企业共同决策制度“是一种阶级妥协，是处心积虑的结果，目的是避免重复 20 年代和 30 年代早期的阶级冲突^②”。

三、关联交易与资本权利

正如上文提到的“雇员至上”充分体现了日本社会是一个“长期承诺的社会”那样，在日本，公司的客户关系和公共关系方面也充分体现了“长期承诺”的特征，这是日德模式与英美模式的重要差异之一。

在英美模式的企业中，公司雇员更关心的是自己和家庭的直接利益以及私人朋友的利益，而日本终生雇佣制导致他不得不去考虑他人的利益，所以，日本人身负多重的义务；例如，他不得不考虑本公司其他成员的利益、长期贸易关系的合作者的利益，等等。而财产和资本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在日本和德国则受到了许多因素的限制和“侵蚀”，也就是说，在日本和德国，除了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和资本权利的因素外，还必须考虑许多其他“利益相关者”，他们包括雇员、顾客、供应商、贷款人、承包商、债权人、地方社区，等等。尤其是在日本，公司更加重视和尊重供

① 引自本书第九章。

② 引自本书第十一章。